

樊纲自选集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樊纲自选集 / 樊纲著.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 - 7 - 80767 - 366 - 8

I. ①樊… II. ①樊… III. ①经济学 - 文集
IV. ①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8005 号

樊纲自选集

著 者: 樊 纲
丛书策划: 赵建廷
责任编辑: 李慧平
复 审: 任 冰
终 审: 王宏伟
艺术监制: 陈永平
整体设计: 陈 婷
责任印制: 李 健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经济出版社
社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4922133 (发行中心)
0351 - 4922085 (综合办)

E - mail: sxjjfx@163.com
jingjshb@sxskcb.com

网 址: www.sxjj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68 千字
印 数: 1 - 3 000 册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67 - 366 - 8
定 价: 26.00 元



总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社会转型与政治改革都表现出循序渐进、健康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等多种力量在同一时期汇聚于中国发展的历史大舞台,为中国的加速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并直接提供了强劲的动力。中国的和平崛起已经成为新世纪人类历史发展新阶段的重大事件,并引起了全世界的普遍关注。

变革的时代必然产生创新的思想。在中国发生这场伟大的历史性变革过程中,中国大陆经济学家,香港、澳门和台湾经济学家以及旅居海外的华人经济学家共同见证和详细观察了这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伟大变迁甚至直接参与其中,根据中国国情并参照国际经验,创立了许多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经济学理论。这些经济学理论一方面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也对这一伟大实践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将这些经济学家独立创新的经济学理论梳理清楚,并整理出来,不仅有利于世界经济学界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家,也有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深入理解中国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

20 世纪,山西经济出版社曾出版了一套《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文丛》,收录了国内 59 位经济学家的选集,在中国经济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21 世纪拟出版一套《当代华人经济学家文库》,收录全球华人中卓有建树的经济学家的代表作。与其他类似的图书相比,这套文库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强调理论性,即所选文章必须是理论性论文;二是强调独创性,所选论文要求理论观点鲜明,而且必须具有原创性;三是强调规范性,即所选论文的写作方式必须符合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规范。

从本文库的编辑形式来看,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首先,每篇作者

自选的论文后面都有一篇作者的自述短文或本研究领域学术权威(包括相关研究机构、学术报刊等)的评论文章,对该文的研究背景、创新意义及其学术影响作出实事求是的评论,以帮助读者进一步理解文章的学术价值;其次,不论作者创新的理论观点多寡,文章长短,著作厚薄,只要有五万字以上文字即可成书,重在原创性;最后,除文库主编(创意提出者与设计者)外,文库编委会成员皆由入选作者组成,为保证本文库较高的学术水准,每部候选著作都必须经编委会成员全数通过,方可入选。

经过近 3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基本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之中。相应地,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家也正逐步走向世界。我们期待着,曾经产生过许多世界上最优秀的古代思想家的中华民族,也将在新的历史时代产生许多世界上最优秀的现代经济学家。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我们希望,这套文库成为当代华人经济学家贡献给历史和后人的一处独特的学术风景,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繁荣与发展之大厦起到铺路石的作用。

主 编

2006 年 6 月 10 日



学术小传

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兼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 100 余篇，专著 10 部。

樊纲 1982 年由河北大学经济系(七七级)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同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主攻“西方经济学”专业，1985 年至 1987 年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及哈佛大学访问研究，1988 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92 至 1993 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 至 1995 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6 年起创办国民经济研究所；2006 年起兼任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2004 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2005、2008、2010 年，樊纲连续三次被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与英《观点》杂志评选为“世界最受尊敬的 100 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目录

经济学基础理论:理论范式与分析方法

论公有制经济中各种利益目标、利益矛盾和经
济行为 3

自述之一 18

灰市场理论 20

自述之二 33

“苏联范式”批判 35

自述之三 54

宏观经济学

父爱主义、兄弟竞争与通货膨胀 59

自述之四 75

国家综合负债:不良资产与金融风险 78

自述之五 89

有效降价与通货紧缩 93

自述之六 106

转轨经济学

非帕累托改变:既得利益与改革阻力

——体制转轨的基本理论问题:

改革及其“阻力” 111

自述之七 135

渐进式改革: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

——非国有部门的成长

与国有部门的改革 137

自述之八 156

平行推进:体制的“不协调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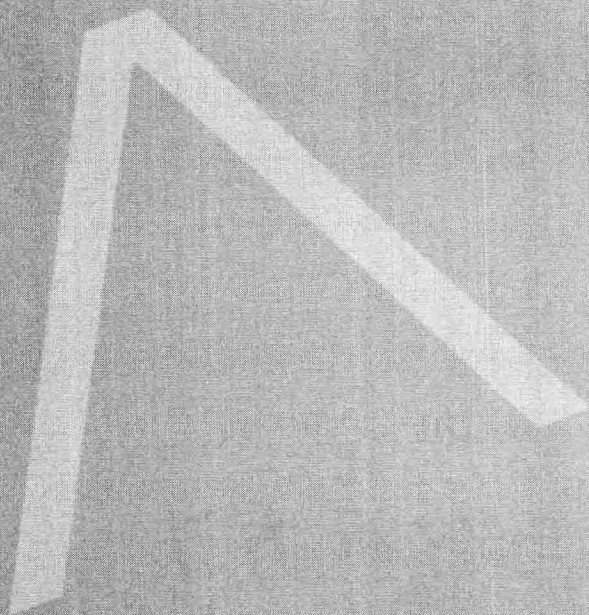
与改革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 158

附录:优化改革进程的模拟模型 172

自述之九 176



经济学基础理论： 理论范式与分析方法



论公有制经济中各种利益目标、利益矛盾和经济行为^{*}

迄今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缺陷之一，就是还未在理论上为各经济行为主体实证性地确认各自的行为目标，也就是各种经济行为所追求的那些特殊的经济利益，并由此合乎逻辑地去分析、论证人们的经济行为及其社会效果。

传统理论关于利益目标的唯一论述，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以及全体社会成员为了那同一的目标“同志式地相互协作”。这样的理论，与其说是从经济生活的现实中概括出的客观必然性，还不如说是阐述一种“理想状态”，从而“教导”人们应该何去何从。所以，事实上它并没有回答“人们的行为利益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个实证性的理论问题。

近些年有的经济学家也曾将利益目标和利益矛盾作为一个问题进行过一些分析，但迄今利益目标和利益矛盾还未在对各种经济问题的理论分析中起到真正的有机作用，没有成为经济分析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论证基础。而说不清人们的行为动机，便不能说明人们为什么这样行为而不那样行为；分析经济问题时若不能依据人们的利益目标和相应的必然经济行为，便不能说明经济现象为什么必然发生，经济学也就总也不能成为严格的分析科学。

本文的目的是试图在这方面将理论推进一步。当然，我们不能对有关的每一个问题作很详尽的论述，而只能通过广泛举例和简单的分析，说明问题的意义和基本的分析方法。

一、一个一般性的例子：个人行为目标

实事求是地分析人们的行为，任何人都可以发现，人们总是在那里权衡利弊，尽可能以较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收益。再进一步分析，不

^{*}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8（1）。

难发现,人们所追求的东西,即人们行为的目标往往是各异的;而人们不同的行为和决策,则正体现着行为目标的差别。比如在我国日常生活中,经常听到人们说某某人“私心太重”,或某某人“大公无私”,这正是人们根据某人的行为做出的关于他的行为目标(“公”或“私”)的判断。我们不妨就以这“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作为一个例子,开始我们的讨论。

(一)“雷锋行为”

雷锋是“大公无私”的模范。其行为的基本特征是自己的需要很低,而尽可能多地为人民、为国家做好事。现在就让我们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雷锋的全部行为中的一部分——经济行为,也就是那些涉及资源或收入的分配、配置和使用的行为。

首先应该确认的是,在经济上,雷锋并不是没有个人的利益:从时间资源的配置上,他必须满足自己一定的休息、娱乐的需要,尽管这部分需要可能比别人都少;从收入的使用上,他必须满足个人日常的衣食住行,尽管他的消费标准并不高(“艰苦朴素”),例如不用香皂,肥皂总还是用的,糖果之类的非必需品,偶尔也还是吃的,等等。否认这种个人经济利益的存在,就是否定了雷锋作为个人的特殊规定性,这并不能给雷锋增添多少“光彩”。

雷锋的特殊之处,不是他没有个人利益,而在于他同时也关心(甚至更关心)他人——人民的利益。作为经济行为的一个具体例子,我们可以举他某星期天到一个建筑工地上推了半天小车的例子。这就是说,他将可供自己支配的一天的“人力时间资源”的一部分,用在为人民服务上而不是自己的休息娱乐上。如果我们认为雷锋的这个行为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合理的根据”的,那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个行为本身所表明的,就是在雷锋的时间配置问题上存在着两个利益目标:一是个人利益(我们用符号 I_1 表示),一是人民利益(用 I_2 表示);同时,它还表明,上述两种利益在雷锋的心目中是以某种方式相关联的,并且是可以以某种方式转化、归算为某种抽象而统一的单位——我们不妨暂将其命名为“复合利益”(用 I 表示)——相互比较的,从而这两个目标以雷锋所特有的方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他的“行为总目标”或称“复合利益目标”。这就是说,雷锋行为的总目标,是一个由两个分目标所决定的函数,形如 $I=f(I_1, I_2)$ 。

为了更加具体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假定在与人力时间资源(以 t 表示)的关系上,上述两个分目标可以分别独立地表示为用于该目标的时间的增函数,也可以说是 $I_i(t)$, $I_i'(t) > 0$, $i=1, 2$ 。同时还可简单地假定这两种利益分别以雷锋特有的某种“固定系数”(用 α 、 β 表示)归算为“共同利益”。这些固定系数,也可理解为雷锋对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关心程度”, β 越大,表明他对人民利益越是关心。这样,上面总目标函数便可具体地表示为以下的特殊形式:

$$I = \alpha I_1(t_1) + \beta I_2(t_2)$$

雷锋的“行为决策”问题,便是如何将他能支配的总时间资源 t 在两种目标上进行配置,即如何将 t 分为 t_1 和 t_2 ,满足 $t_1 + t_2 = t$,以使作为总目标的“共同利益”达到可能的最大。从函数式中不难看出,雷锋之所以能在星期天去为人民“做好事”,就是因为他对人民的利益是关心的,也就是 $\beta \neq 0$ 。“做好事”便是雷锋具有的那种特殊行为目标函数的一个经济结果。

以上是举例说明问题。在更一般的形式上,我们还可同样的方法分析雷锋的其他行为,如收入的使用(他曾将自己的储蓄寄给灾区人民)、工作上不畏艰苦(为人民利益而付出较大的辛苦)等。

(二)一般的个人行为目标及行为方式

以上的分析尽管简单粗糙,但它至少已有利于澄清一个曾经引起很大争议的问题,即人究竟是“为私的”还是“为公的”问题。我们这里至少已经可以表明,在公有制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有个人利益,因为个人利益是个人的特殊规定,否定了这一点就否定了个人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存在。人们的区别只是在于:(1)在一个人的总利益目标中,是否包含了“人民利益”;(2)对人民利益关心程度的大小;(3)人民的利益与一个人的行为目标,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阶级敌人”视人民利益为自己的“负利益”),他是否“损人利己”,也就是前面那个具体的目标函数中的 β 是正数还是负数,等等。

经济学的任务,不仅在于描述各种人的经济行为及其利益目标,而且也在于:(1)说明在特定的客观条件和经济关系下,人们必然也会有什么样的利益目标函数并据此做出怎样的行为决策;(2)实证性地确认(而不是理想化地要求)经济中的大多数人、一般人事上具有怎样的目标函数和行为方式;(3)在此基础上,说明经济中必然存在什

么样的利益矛盾,这种矛盾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如何,等等。

在公有制经济的条件下,全民的利益或集体的利益是一个客观存在,因此一个人的个人利益必然会与公共利益发生一定的联系,公共利益至少已经进入了一部分人的行为目标函数,这是不容否认的现实;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无法说明许多人的行为。但是,在目前条件下,还很难说公共利益已经进入了大多数人的目标函数,至少很难说人们对公共利益的关心程度已经很高。经济学的分析若是将雷锋的行为和目标函数作为典型情况并当做一般的论证基础(比如说,认为经济可以依赖于雷锋式的“义务劳动”),那么据以制定的经济政策就必然要犯错误。不过这一点还有赖于科学的经验论证。

二、国营企业的行为目标

生产者在任何经济中都构成主要的经济行为主体之一。公有制经济中的企业行为也是整个经济运行的核心。这一节,我们将通过对企业行为目标的分析,说明经济行为主体的不同利益目标对于整个经济运行结果的影响。我们将抽象而集中地讨论行为目标与行为方式、行为结果的关系,而对其他影响企业行为的种种因素,则一律视为不变的前提,如追求和实现利益目标的社会机制、资源约束和预算约束等。

传统的企业行为理论,一般都假定企业所追求的目标是最大利润。但许多研究都已表明,这对于目前许多资本主义企业来说,也往往只是近似正确,许多情况下甚至是不适用的;对于公有制下的企业来说,似乎就更是这样。因此,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确认不同于传统理论的企业目标函数,以便在理论上分析其行为方式和必然结果。这不是一个为企业“设计”行为目标或认为它应该如何的问题,而是考察企业实际上在如何做的实证性问题。

(一)传统机制下的企业行为

在传统的经济机制下,企业与上级主管部门和中央计划当局具有直接的隶属关系,因此其行为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上级”的目标影响甚至决定。具体地说,就是由上级下达的各项“经济考核指标”以及上级对这些指标中的某几项的重视程度决定;而这些目标之间,有些是相辅的,有些则是相矛盾的,或是在一定条件下相矛盾。例如,在产

量超过一定数额以后,产量增长与利润增长就会因技术条件和成本条件而相矛盾。为了在较为简单的情况下说明问题,我们假定上级下达的指标只是两项,即产量(总产值)指标和利润指标。在过去的实践中,这两个指标通常也是最受重视的。

在给定上述考核指标的前提下,企业会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确定某种特殊的行为目标。可能的供选择的目标有若干种,我们以两种可能的目标为例。

1. 当“先进”或至少是“不落后”。争当先进可能出于种种考虑:为了得到某种“好处”,无论是企业决策人自己得到好处还是全厂职工得到好处;或者就是出于为国家多做贡献的动机;或仅仅是一种荣誉感。无论如何,当“先进”这个既具体又抽象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上述任何一种动机或几种动机的组合。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也就是为了使当先进的可能性达到最大,企业就必须首先对如何确定产量更有可能当先进这个问题做出判断。首先,在完成一定的利润前提下,产量越高,当先进的可能性越大。我们用 Q 表示产量,用 $P_1(Q)$ 表示“当先进的可能”(P_1)与产量大小的函数关系,这显然是一个增函数。但在另一方面,在企业各种生产资源都已得到正常利用的条件下,产量越高,由于原料难搞、设备利用过度和加班费增加等原因,使成本提高,利润不能无限制地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会呈下降趋势。我们用 π 表示利润,用 $\pi(Q)$ 表示产量与利润的函数关系,并假定它到一定阶段后是一个降函数。再用 $P_2(\pi)$ 表示利润与当先进的可能性(即 P_2)的关系,并假定这是一个增函数。企业的决策任务,就是要在可能的条件之内,选择一个最佳产量,使当先进的总的可能性 P 达到最大。我们不妨简单地假定要使上述两种概率之和达到最大,这样,企业的目标函数即可表示为:

$$P=P_1(Q)+P_2[\pi(Q)]$$

不难证明,在存在总产值和利润这两种目标并且是“两难目标”的情况下,企业最终确定的“最佳产量”,必然大于单纯以最大利润为目标的产量,而利润必然低于最大水平。这可由图 1 表示。图中的 Q^* 、 π^* 表示单纯以利润为目标的企业的最佳产量和相应的最大利润, $\bar{Q}$ 和 $\bar{\pi}$ 则表示在存在两种目标情况下企业的最佳产量和相应的利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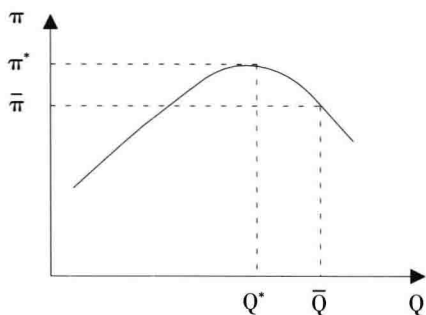


图 1

这样我们也就证明了,即使国营经济的计划部门和企业并不是单纯以最大产量为目标,即不完全由“数量冲动”所支配,而是同时也追求利润,而且即使企业的预算约束是“硬的”,但只要总产量指标作为考核和受到鼓励的指标之一,整个经济的产量就必然会大于传统理论中的“均衡产量”,更接近“资源约束”所限制的极限水平;同时利润(净产量)水平也必然较低。(这里我们丝毫不评价这种情况是“好”是“坏”。作这种评价还要引入别的因素,这不是本文的任务。)

2. 奖金最大。这是另一可能的企业行为目标。奖金一般是与超额完成总产值计划或利润计划的大小挂钩的,因此,在简单的情况下,企业的问题便可归结为选择某一生产量使奖金达到最大。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计划指标通常是“滚动的”,今年超额多,明年计划指标便可能提高,超额的困难加大,奖金便可能减少。在这种复杂情况下,企业的行为目标也会复杂起来,它会以长时期的最大奖金为目标,而不是只顾当前。我们假定奖金与超额总产值挂钩,完成一定的利润只是个限制条件;同时假定企业只考虑今年和明年两个时期的问题。设第一年的计划产量任务为 q , 企业完成的产量为 Q_1 , 超额产量即为 $Q_1 - q$; 奖金以 B_1 表示,它是超额产量的边际递减增函数, $B_1 = B_1(Q_1 - q)$ 。第二年的计划产量任务是第一年实际完成产量的一个倍数,假定这个倍数是固定的,等于 $(1+a)$, 其中 $0 \leq a < 1$, 称 a 为“滚动系数”。这样企业第二年获得的奖金将为 $B_2 = B_2[Q_2 - (1+a)Q_1]$ 。于是企业的目标函数便可表示为:

$$B = B_1(Q_1 - q) + B_2[Q_2 - (1+a)Q_1]^{①}$$

① 为简化分析,本文中一律假定不存在利息率,也就是对未来的价值量一律不进行折现。

据此企业选择“最佳的” Q_1 和 Q_2 ,以求实现最大可能的 B 。

不难证明,给定各种限制条件,在这种目标函数支配下,企业选择的第一期的最佳产量 Q_1 ,必然小于不存在“计划指标滚动制”时的最佳产量;而且滚动系数 a 越大, Q_1 越小。这个分析,适当转换一下,也可适用于奖金与利润挂钩的情况。

(二)企业行为“短期化”问题

经济体制改革后,企业实行各种经营责任承包制,解决了传统体制下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即所谓“企业行为短期化”。这个问题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企业的行为必须由企业的特定利益目标来加以说明。当然,企业为什么具有某种利益目标,也要加以说明,这主要由经济关系和经济体制来说明。但作为体现经济关系的利益目标一旦被说明和确定下来,便在经济分析中起到直接的和独立的作用:它构成经济行为直接的内在原因。我们这里便以企业追求短期(承包期)利益为出发点,分析这种利益目标必然会导致怎样的经济后果。

我们以资金利用为例。企业经营决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将现有的财力、物力在当前生产和技术革新、设备更新、风险投资等与未来生产相关的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一个企业若追求的是长期利润,它便会将当前可利用资金(以 K 表示)在这两方面的用途上按照长期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分配。以 K_1 表示用于当前生产的资金,以 π_1 表示当前生产所能提供的利润,它与 K_1 具有一定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pi_1(K_1)$;用 K_2 表示现在就投入使用但目的是为了保证和提高将来利润(π_2)所需的“研究发展资金”, K_2 与 π_2 之间也以某种可预期的方式形成一定的函数关系,即有 $\pi_2^e(K_2)$,这里上标 e 表示这种函数关系是预期的。这样,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begin{cases} \text{Max } \pi = \pi_1(K_1) + \pi_2^e(K_2) \\ \text{s.t. } K_1 + K_2 = K \end{cases} \quad (1)^{\text{①}}$$

对此问题求解,得出最佳 K_1^* 和 K_2^* ,其中 K_2^* 便是企业的最佳研究发展资金额。

① 这里“Max”表示“求最大”。“s.t.”表示“满足下列条件”。

而对于一个行为短期化的企业来说,问题却只是求当前(承包期)利润最大化,这样,上述最大化问题实际上消失了:它只需尽可能地将资金用于当前的生产经营,只要这样做,利润量(而不是利润率)还会增长。即使在承包合同中规定了必须进行的某种最低限度研究发展投资(我们以 $K_{\min}$ 表示),上述最大化问题仍不存在:企业只需在满足这个最低限度的条件下,把余下的资金 $K-K_{\min}=K_1$ 全部投入当前的生产就行了。

这一分析的一个“政策含义”便是:在实行经营承包制的情况下,要想对企业行为短期化造成的资源利用缺乏效率(长期效率)的问题进行尽可能的“补救”,只有根据公式(1)中的长期利润最大化问题求出 K_2^* ,并以某种方式将其转化为承包条件之一在承包合同中明确加以规定,从而使企业短期化行为中的 $K_{\min}=K_2^*$ 。当然,这样做并不能完全解决资金利用的长期效率问题,比如企业仍可以不关心这笔研究发展资金(包括风险投资)如何具体有效地使用,但这毕竟不失为一种尽可能的补救措施。

三、投资问题上的目标差异与利益矛盾

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利益目标进行分析,目的不仅在于说明各行为主体本身如何行为,而且还在于要说明不同的行为主体的行为之间为什么发生必然的矛盾冲突,以及这种矛盾冲突必然产生的经济后果。本节我们就以公有制经济中的投资问题为例,说明不同的利益目标如何导致利益矛盾并如何决定经济的运行。

投资问题是个大问题,即使仅从投资目标与投资行为的角度分析,也有很多内容。我们这里仅就中央与地方在投资上的利益目标的差异与矛盾,作一简单的讨论。

公有制经济中过去和现在的投资机制的基本特点之一,是除了无须中央批准的地方、企业自筹资金的投资外,中央计划部门在各地、各部门争取更多投资的直接、间接压力下,在反反复复讨价还价的“争议”机制中,决定国民经济的积累率和投资总额的分配计划。这样,我们要想说明投资现象,就必须说明中央最后为什么要“压”投资,地方、企业又为什么要争投资,也就是说它们双方所具有的利益目标究竟是